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我對九七特刊的看法

《二十一世紀》6月號出版一九九七特刊是應有之舉。「評論」作者清一色都是香港本地或海外的名家，他們很自然地會着眼於香港本身，思考的角度多是大陸今後對香港的影響——香港的前途、一國兩制在香港能否真正實行之類，而沒有怎麼討論香港今後對大陸的影響之類問題。但對我來說，這類問題更為重要。

比如，一國兩制的作用不但是對香港的，其實也是對大陸的。一國兩制既使中共政府收回、控制了香港，又使大陸仍與香港隔離。所以，一國兩制不僅保護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也保護了大陸的社會主義(?)和一黨統治。一國兩制使大陸有了「合法」藉口，繼續封堵香港自由言論的進口。對香港人來說，回歸後仍然是馬照跑，舞照跳；而對大陸的中國人來說，則是香港照樣去不了，香港的報紙照樣看不到，香港的電視新聞照樣「開天窗」。當然，長遠地看，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最終會使中共付出越來越重的政治利息。

余英時先生的文章指出香港交接定在1997年，等於是承認了1898年的租約的合法性。余的分析很對，說中了中共的

尷尬處。然而，這期特刊對香港歷史的挖掘仍不足夠。例如文革時的香港左派暴動、難民潮等，我們在大陸知道得很少。

胡文輝 廣州
97.7.10

陳之藩致陳方正

方正兄：

拜讀過一九九七特刊的大文，甚為佩服。

您的大論，我有篇文章與之大致相同。那是在1982年，十五年前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如果《二十一世紀》每篇文章都有references的話，您應引我1982的文章，才算公平。但1982年您也許並未注意。茲為證明起見，特寄上我的散文集一本(陳之藩：《陳之藩散文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95)，請參看其中的《一星如月集》的頁85-88。

之藩 台南
97.7.15

作者的回應

之藩兄：

小文得蒙青睞，真太高興了。沒有注意到和引用你十五年前的先行之作，謹此告罪。

但數十年來一般地批評英國的和大陸的社會主義為「失敗實驗」而頌揚香港為「可效法模式」的文章很多，一一徵引，目錄恐將長過本文。同時，這篇小文重點在於對近十餘年的發展以及具體政策作較直接的論述。因此，這一關失，也許是可以諒解的吧？

方正 香港
97.7.28

值得警惕的現象

毛丹青在貴刊今年6月號上發表的文章，對近年來活躍於日本的中國學者提出批評，並對一些現象表示憂慮。該文在肯定中國學者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亦對越來越多中國學者改變研究日本的初衷，紛紛加入用日文寫作的中國問題研究行列提出質疑。之所以產生這種面對鄰邦演出的中國人大唱中國戲的現象，一方面是出於日本社會的輿論需要，另一方面是搞中國問題比研究日本更容易嶄露頭角，而且這類中國問題的研究大都以分析事件、預測政局為主，能夠發揮中國人從國內收集文摘以及有關資料的長處，而這也是日本學界之所以歡迎這類研究的理由之一。相對於旅日中國學者有助於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而言，中國對日本問題的研究仍然是落後的。此外，這些本來應該發揮前沿作用的旅日中國學者由於要爭取留日教職，他們大多數轉而以研究中國為自己的專業，使得他們對日本問題的觀察與發言就變得無聲無息

了。這樣下去，日本會越來越了解中國，而中國會越來越不了解日本。該文最後呼籲中國知識界應該重視這批旅日中國學者的存在，為他們的著述撰稿創造良好的條件，發揮他們作為旅日學者研究日本的優勢。

冰之 東京
97.6.12

比較貴刊兩次「激進與保守」的爭辯

我認為，貴刊今年2月號刊載甘陽一文，開始了有關於激進與保守的第二輪爭辯。對此問題的第一輪論爭是1992年由姜義華、余英時在貴刊展開的，他們所開啟的「思想文化—社會政治」的雙維度交疊的致思模式，已大致設定了這一論爭的思考視域。只不過比較起來，兩次爭論，前者更多以中國為歷史背景、以傳統為思想資源、以成為過去的經驗事實為分析對象，從中引伸出於現實有影射意義的結論來。而甘陽的論述，則將關注的重心扭轉到以世界為歷史背景、以現代為思想資源、以制約將來的理論抉擇為分析對象上來，並設立了一個一次性、總體化地解決現代社會「應當」是甚麼樣的論述目標，把中國與西方一鍋煮，表現了以膽子大為特徵的理論企圖。

但是，不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論爭，都未能滿足在闡釋問題時所要求的兩個合理性條件。一個是理論上的自治性，另一個是對歷史與現實的

事實相符性。就第一次論爭而言，余持思想文化論據激進與保守，而姜站在政治需要的角度不合理地要求前者為思想史以外的整個歷史情形提供解釋，雙方的爭論是南轅北轍，無法尋找對話的共同基礎，最後只好不了了之。今年甘陽等重提激進與保守的話題，但他對那些極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表現得較為輕率。如對柏克的批評便流於簡單化，對自由與民主的雙向對應關係只加以單向的處理。面對現實，他在解釋中國當代的政治選擇時，便把制度性民主脫離開作為其依據的自由，把政治要求的激情視為政治良性運轉的最重要條件，把積極自由看得比消極自由更為重要。因而，理論與現實的解釋力度都大大下降。他批評他人的高度自信、超越自我的信誓旦旦，就使人無法認同和信賴。

其實，縱觀兩次論辯，內在潛蘊着的是雙重的焦慮。一重是理論的焦慮。面對西方理論霸權，一種試圖與之抗衡並超越的理論衝動，常常使中國知識人躍躍欲試。另一重是社會政治的焦慮。中國現代化的後發及外生性質，早已使自承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中國學人憤懣不已，常常試圖為「只爭朝夕」的運動式現代化進行理論籌劃。而當前中國現代化可謂「曙光初露」，這使學者們自信心大增，與官方甚麼都在「軟着陸」異曲同工，學人們急於對社會政治選擇去表態，從而使他們所下的判斷亦常常失去理據。我認為，只有克服焦慮，不急於下結論，才能期望有效分析中國社會發展應取甚麼樣的範式。

任劍濤 廣州
97.4

應重視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

《二十一世紀》雜誌從1995年底展開了對中國文化界現狀和後學運作立場的討論。按理說，這些論題應該涉及到張承志，而且他又是90年代大陸文化界的焦點，可這些人的文章卻從未提及他的名字。直到1996年10月號《二十一世紀》才遲遲出現許子東的文章——〈張承志：守衛昨日之夢——從《金牧場》到《金草地》〉。該文顯示了許子東一貫的嚴謹學風，自己盡量少發議論，而以細緻的文本解讀來讓「守舊的」張承志自己發言。儘管此文具有較強的學理性特點，但我覺得仍然是從單純肯定中國今天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這篇文章與張頤武、王蒙等人的觀點並無本質差異。而且不知許子東是否想過，他通過對比《金草地》和《金牧場》的刪增，呈現了張承志守舊的一面，可是這種呈現是否又遮蔽了他對中國統一與和平安定的珍視與焦灼？許子東是否也應該細緻地比較一下從《夏台小憶》到《夏台之戀》呢？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大多數文化人對中國民族問題所潛藏的危機缺乏應有的敏感與基本的認識，而且是在有意無意地迴避。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文化人首先要睜開眼睛，直面中華民族的傷口。這種直面，更多是對漢族文化人來說的，因為他們實際上佔據着話語的中心位置。

姚新勇 南京
97.7